

共匪「文化革命」與「文字改革」·上·

汪學文

一 前言

文化乃人類基於生存之要求，在羣體或交互關係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事物之總稱。因此社會學家華特謂為「人類的成績」，華萊史稱爲「社會的遺產」。

每個不同社會的文化，有其不同的文化模式 (Culture Pattern)；而文化模式之構成，均以各該社會之文化遺產爲基礎、傳統文化爲中心。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由於新的創造發明和吸收外來新文化，必然不斷地充實、改造，但其特質不變、類型不易，換句話說，其傳統文化不應亦不能全部揚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始終爲兩大不同類型，祇能交流而不能融併的原因在此，中國人不能「全盤西化」的道理也在此。因此，文化祇能演進，不能革命。然而，毛匪澤東認爲：「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爲它們服務的；因此他主張「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並強調地指出：「不把反動的舊文化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註一）所謂「舊文化」，就是我國傳統文化，所謂「新文化」，就是共產主義文化（包括「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而「破除舊文化」就是破除傳統文化，「建立新文化」就是移植共產主義文化，也就是「全盤西化」。

毛匪認爲「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是「社會主義」。因此，早在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提出「文化革命」的口號。四十七年五月，匪黨八屆二次會議決定要「在繼續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積極地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現階段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口號，是共匪「解放軍報」於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的社論中才正式提出的。

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交流思想的媒介，更是發展文化的動力。共產黨人對語文的功用特別重視，認爲語文既是人類交際的「工具」，也是社會鬥爭的「武器」。因此，毛匪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討論「文化革命」時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衆」；四十七年匪黨中央則將「完成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進行漢字的改革」，列爲「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在現階段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匪則宣稱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自然包括文字改革），並且對於反對簡化漢字者進行批判和圍剿。

共匪的所謂「文字改革」，其目的就是廢除漢字，實行「拉丁化」。共匪之所以要廢止中國文字，並將「文字改革」列爲「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理由很簡單，乃是由於中國文字的本身就寓有中國傳統文化。誠如瑞典文字學家高本漢 (B. Karlgren) 所說：中國文字乃中國文化實在之基礎。「在別的國家，文學隨語言而變遷，所以只要隔了幾百年，便演成一全新的文學。英國人對於三、四百年前的英國文學，罕能了解其意義；再推上去，那祇有文字學家才能欣賞它。中國則上下數千年，暢通無阻，中國人實

變其古代文化，亦其文字特性使然。」（註二）

共匪的「文字改革」既以消滅漢字，實行拉丁化為目標，實際上就是「文字革命」。文化祇能演進而不能革命，文字也祇能演變而不能革命。數千年來，各國文字的變化並不甚大，其變化也是逐漸演變的，它與語言一樣，沒有「突變」。漢字的演變發展，實際上是沿着兩條道路，一條是簡化，目的在便於書寫；另一條是繁化（分化），其方法大都是增加偏旁，目的在使字義益為明確而便於表達語言和思想。片面地強調簡化固有違其發展規律，以人為的、突變的方法去強迫其簡化，更有違文字自然演變的法則。同時，中外文字一開始即走上不同的道路。而中國文字的特點，是基于中國語言的特點。我們祖先沒有使文字走上字母之道路，決非因為我們祖先之天生愚蠢或落伍，而實因中國語言之特性使然。中國的語言基本上是單音節，同音之字，意義不同，非有同音同韻異形異義的形聲字，不能使語言文字貫通，也不能使語言文字免于混淆，這是中國文字不能採用拼音字的基本原因。因此，強要中國文字實行「革命」，走「拼音化」的道路，其與「全盤西化」或「全盤赤化」，同為不合理和不可能的事！

二 「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與

「文字改革」

毛匪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有兩種文化，一種是「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另一種是「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毛匪又把中國的「文化革命」，分成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以「五四」為分水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是「新民主

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具有兩大任務，一為反對西方文化，一為反對傳統文化。

毛匪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最後一節中，提到「文字改革」。他說：「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第十五節）所謂「一定條件」，根據匪區語文工作者的解釋，又可分為「基本條件」和「一般條件」。「基本條件」就是「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語言學中的問題」，而「一般條件」則包括：

○推廣普通話——即使漢語書面語趨于口頭化和規範化，以便於拼音，而利於拼音文字之確立。

○改革書刊排式——即改直排為橫排，以便宜於拼音文字之書寫。

其實，共匪的「文字改革」在毛匪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二十九年一月）之前即已試行，其早期的所謂「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於民國十七年即孕育于俄境，二十年完成於海參威。

民國二十年在海參威召開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決定「根本廢除象形文字（漢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

民國二十三年，「左聯」份子在上海掀起「大眾語運動」，繼即推行「拉丁化運動」。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六年八月的三年中，各地由共匪策勵組織之拉丁化團體約七十有餘，其中「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成立最早，後來「中國新文字研究會」亦在上海成立。拉丁化新文字除所謂「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以外，各地還先後擬訂方言方案十餘種如下：

○寧波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三年十一月擬訂。

○潮州話拉丁化方案——二十四年十一月擬訂。

○四川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一月擬訂。

○上海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二月擬訂。

○蘇州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三月擬訂。

- ⑥ 湖北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四月擬訂。
 - ⑦ 廣西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四月擬訂。
 - ⑧ 無錫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六月擬訂。
 - ⑨ 廈門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七月擬訂。
 - ⑩ 客家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八月擬訂。
 - ⑪ 廣州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十月擬訂。
 - ⑫ 福州話拉丁化方案——二十五年擬訂。
 - ⑬ 溫州話拉丁化方案——二十六年四月擬訂。
- 由此可知共匪文化陰謀之狠毒，覆被地區之廣闊。抗戰初期，所謂「拉丁化運動」仍在上海、漢口、廣州、重慶、香港等地暗中推行，直至抗戰末期，政府下令禁止後，始銷聲匿跡；而在延安，亦因難於推行而中止。

三 「社會主義文化革命」與「文字改革」

共匪竊據大陸以後，毛匪於民國四十年兩度約集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諸匪討論文字改革問題，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共匪認為漢字的簡化和拼音化是整個「文字改革」當中的兩個必然的步驟，也是進行「文字改革」的有計劃的先後的實施。因此，共匪於四十五年一月公佈「漢字簡化方案」，四十七年二月又公佈「漢語拼音方案」。

「漢字簡化方案」包括「漢字簡化第一表」（計列二三〇個簡化漢字）、「漢字簡化第二表」（計列二八五個簡化漢字），及「漢字偏旁簡化表」（計列五四個簡化偏旁），從四十五年二月一日起，分四批推行。在推行遭「方案」中，據說關於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由於交代得不够明確，致在教學上發生了不少困難，在印刷上也出現了許多分歧，偽「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及「教育部」根據偽「國務院」的指示，乃於五十三年三月七日給匪區各地各級學校和新聞出版印刷部門發出聯合通知，就「漢字簡化方案」中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作了明確規定。五十三年五月，偽「中國文字

改革委員會」為樹立使用簡化字的明確的統一的規範，以消除簡化字使用方面的亂用和分歧現象，又編印「簡化字總表」一種，內分三表，第一表收「不作簡化偏旁用的簡化字」三五二個，第二表收「可作簡化偏旁用的簡化字」一三二個及「簡化偏旁」一四〇個，第三表收「應用第二表所列簡化字和簡化偏旁得出來的簡化字」一七五四個。至此，共匪推行的簡化漢字，總數已達二千二百三十八個。

「漢語拼音方案」計由五部份構成，即「字母表」、「聲母表」、「韻母表」、「聲調符號」及「隔音符號」。所謂「漢語拼音方案」，並不等於「拼音文字」，目前僅是「拼音字母」而已，其主要用途乃是為漢字注音和協助推廣普通話；必須俟同音字之區別方法訂定、詞兒連寫之規則確立，以及有關問題解決後，始能構成「拼音文字」。

共匪將「推廣普通話」也列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之一，這是策略上的一大轉變：共匪竊據大陸以前，在蘇俄策劃下，一方面企圖篡改中國文字，會推行「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使之走拉丁化道路；另一方面又採分化策略，曾在各地先後擬訂方言方案十餘種，反對國語統一運動。及竊據大陸以後，始扭轉分化策略，積極推廣普通話，致力於「漢民族共同語」之建立。考其轉變政策之原因，約有二端：一為受史達林教條之影響。史達林於一九五〇年曾說：「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為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從於自己」。另一原因則為適應漢語拼音化之需要。因為統一的語言（包括語音、語彙、語法）為實行拼音文字的必要條件，共匪「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為拼寫根據，因而推廣普通話以促進語言的統一，是共匪實行漢字拉丁化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共匪推廣普通話乃是為文字拼音化鋪平道路。故自民國四十四年十月舉行第一次所謂「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以來，共匪始終將「推廣普通話」視為嚴肅的、重要的「政治任務」。

四十五年九月，匪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註三）中，會將「文字改革」列入計劃，建議「在全國各地區努力掃除文盲，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文字改革」（第十一條），並「大力培養少數民族的幹部和科學技術人員，幫助創造和改革少數民族的文字」（第十三條）。

四十七年五月，匪黨正式提出「文化革命」運動，並將「文字改革」列爲「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因爲當時有關「文字改革」的各種方案，雖均已制定公佈，但其距離目標尙遠，且阻力與困難尙多，有待繼續施以壓力，以助其推行。「文化革命」運動，係由劉匪少奇代表匪黨中央提出。劉匪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註四）中說：「黨中央認爲，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計有：

○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逐步發展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

○完成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進行漢字的改革。

○消滅「四害」，講究衛生，提倡體育，破除迷信，移風易俗。

○開展羣衆的文化娛樂活動，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

⑤培養新知識份子，改造舊知識份子，建立一支成千萬人的「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隊伍」（包括技術幹部的隊伍，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

上項報告，經匪黨八屆二次會議通過後，旋即在文化教育上掀起一大高潮，同年九月，匪黨中央與僑國務院又聯合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展開了「教育革命」；而掃除文盲工作亦進入新階段，普遍推行「萬民教、全民學」運動。但是由於「生產大躍進」的失敗，蘇俄技術人員的撤退，以及四十九至五十一年間的連續自然災害，給匪區帶來了全面的經濟困難，「文化革命」遂陷于停頓；農民苦于生活困擾、體力不支與勞動強度之繼續增加，對學習文化毫無興趣，因而強迫推行之掃盲運動，亦無形停止。而「文字改革」工作，在四十九年四月匪黨中央宣稱「爲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之後，不僅漢字未即繼續簡化，反而連普通話之推廣，以及漢語拼音之推行，都無形中趨向於半停滯狀態。

由於「文化革命」的停頓，共匪對知識份子政策無形中稍予放寬，於是大陸文化學術界的反共反毛活動由暗而明，由消極而積極。因而出現了夏衍

對於「繼承三十年代文藝傳統」的鼓吹，瞿白音的「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翦伯贊的以「歷史主義」爲骨幹的史學綱領，吳晗、田漢的「海瑞罷官」、「謝瑤環」等劇本，以及鄧拓、廖沫沙、吳晗的「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等諷刺性雜文。

（上接第50頁）

一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在蘇俄同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接近之後，也就是兩國在建立起正常的經濟貿易關係之後，蘇俄就可以達到下列一連串的目的：第一、它可以減輕軍備競賽的負擔，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到經濟建設的投資上；第二、它可以從美國方面得到它想望已久的化學工業成套設備、最新科學技術成就的交換，一筆數目鉅大的貸款；第三、它可以放手同英國、西德、日本及其他北大西洋工業發達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和貿易活動；第四、可以澈底的將西方行了多年的禁運表變成一張廢紙。

總而言之，國際因素在蘇俄的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地位，比任何一國爲高，它每一個計劃努力的目標，并不是同一一般一樣，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而是在如何提高蘇俄對國際上的影響。柯錫金在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時就說：「假如說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對蘇俄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局勢有其愈來愈加增長的影響，則世界局勢也以一定的程度來影響我國的計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進行、速度和遠景。」跟着他更明白的說：「假如說一切祇是以我國爲轉移的話，我們毫無問題就要走向實質的裁減軍事支出，并且適當的擴大用於國民經濟平時各部門、用於進一步增加國民收入中消費方面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比。」

我們從柯錫金這幾句話裏得到一個答案，正式的新五年計劃難產的原因，是蘇俄正在謀求如何裁減軍事支出和進一步增加國民收入中消費方面基本建設的百分比。前一個任務是消極的，後一個是積極的，客觀上的形勢限定蘇俄，必須先完成消極方面的任務，才能達到積極方面的目的。蘇俄要完成它消極方面的任務的話，就不得不謀求與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接近。

至於說美蘇關係進一步接近以後，有共同制匪的作用，那祇能說蘇俄在國內的經濟問題解決以後，它已無內顧之憂，可以行有餘力的去專心解決匪俄之間的問題，當作一種副產品來看則可，當作一種正產品看則期期以爲不可。